

集体行动视角下社区体育治理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廖建媚, 陈秀平

(厦门理工学院体育部,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社区体育治理是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强基之举。多元主体协同是社区体育治理的本质要求,但受历史、文化及认识的影响,在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协同不足,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运用文献资料、理论分析与逻辑分析等方法,从“集体行动”视角,分析社区体育治理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旨在助力全民健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认为,在“理性经济人”与“集体行动规模”的影响下,治理主体因公私利益的博弈,陷入“囚徒困境”;因公私权责模糊,造成“公地悲剧”;因“短期利益至上”,难解“搭便车怪圈”。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破解路径:一是基于治理理念的引领与治理情感的共鸣,重塑个体理性;二是强化制度设计的规范与技术嵌入的牵动,唤起公共理性;三是借助内部驱动与外部推动的双向合力,促进治理主体的有效合作,提高治理效能。

关键词:社区体育治理;集体行动;多元主体;理性重塑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4)06-0016-09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Action

LIAO Jianmei, CHEN Xiup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Abstract: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is a strong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cogni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the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is insufficient, which brings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paper uses literatur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ilemmas existing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the solution path, aiming at helping the national fitnes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collective action scale”, the governing body falls into a “prisoner’s dilemma” due to the gam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resulted from the ambiguity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of the “short-term interests first”,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free rider cycle”.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the solution path is proposed: first,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governance concept and the resonance of governance emotion, reshaping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he second is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ms and technology embedment of system design to arouse public rationality; The third is to use the two-way force of internal drive and external driv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oper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Key words: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collective action; multiple subjects; rational remodeling

工业时代以来,社区成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单元^[1]。相较以往,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样、社区事务也越来越复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因为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利益冲突更加难以调和,理性的个体意识导致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得失。所

以,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集体行动开始变得愈发困难。从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理论角度来看,“当共同受益的机会出现时,群体会形成并采取集体行动”^[2]。换言之,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理性经济人会自发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共同的利益。但

收稿日期:2023-08-24

第一作者简介:廖建媚(1979—),女,福建顺昌人,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社区体育指导。

是,让所有人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这并非易事。社区治理中,集体行动同样重要,但也存在集体行动困境的事实。

社区体育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3]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政府部门间模糊的权责边界、体育组织不足以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部分职能、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低等问题,导致多元主体在合作时难以达成一致,产生社区体育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极大地削弱了社区体育治理之效能。治理主体作为第一要素,只有当多元主体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实践中的问题,才能提高其治理效能。切实提高社区体育治理的效能,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当务之急。

针对社区体育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的现实问题,学界往往借助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聚焦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讨论,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抑或局限于现状—问题—对策的一般性分析范式,学理性不足。我们的问题是:合作作为解决公共性问题的理想范式,应然触发“乘数效应”^[4],即“1+1>2”,为什么社区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是否能用一个更加契合、新颖的视角去解读诸多主体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困境超越,各主体之间如何实现合作?这样的合作又该如何展开?

以上疑问构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单一主体分析视角相比较,从“集体行动困境”的视角出发,能够更加契合地分析社区体育治理中多元主体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在问题的共性中抓住其本质,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之策。

1 集体行动的内涵及其对本研究的切适性

1.1 集体行动的内涵

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哲学圣贤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秩序关怀之说。通过对集体行动的观察,亚里士多德主张公民为了城邦的公共利益而参与公共活动,以此实现公民道德正义与城邦秩序正义的统一。他认为:“人的政治正义是自然正义的一种延伸,城邦的正义需要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实现”^[5]。麦卡锡与扎尔德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行动的运作中,他们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和理性选择的过程促进集体行动的产

生^[6]。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则认为“集体行动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建构,集体行动往往与组织相结合”^[7]。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问世,正式开启了对集体行动的系统性研究,他认为集体行动就是“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被认为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8]。针对什么是集体行动,学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集体行动是为了实现大致相同的目标或者利益,一群人做出的一致行动。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满足以下前提:第一,行为主体至少是两个;第二,主体之间的行为动机一致,即拥有共同目标;第三,行为主体间的活动是有机联系的持续性过程。

集体行动的研究者认为,人是具有理性选择的个体,总是希望付出的成本最小而获取的利益最大,所以会对付出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在个人理性的支配下,个人参与集体行动如果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就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对此,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8]概念,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9]模型,罗宾·道斯提出的“囚徒困境”^[10]模型,为“集体行动困境”的分析丰富了研究工具。同时,奥尔森认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制度才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8]。此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支持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观点^[11]。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价值之一体现在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强调行动者的共同参与和自我行动,从而建构了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框架^[12]。

1.2 集体行动对本研究的切适性

社区体育属于典型的复合型治理领域。社区体育作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基石,是多元主体在制度协调下,通过协商、合作的运作机制,运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共同处理公共性事务的互动过程。就政府内部而言,单纯依靠体育部门的力量难以奏效,需要联合文化、教育、民政等多部门进行协同治理;就政府外部而言,需要加强与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互动合作,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居民志愿者的作用,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任海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社区体育的实质就是突破“条条”和单位的封闭格局,社会各方通力协作,形成一个共生的体育生态系统^[13]。同时,治理并非一种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正如俞可平所言,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即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合作,形成一

个有机的共同体,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14]。社区体育治理作为一种过程,需要建立与维持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才可实现。就此而言,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社区体育治理,有较强的适用性。

2 集体行动视角下社区体育治理成果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中国迈入“治理时代”,随之带来“治理”研究范式的大面积兴起。在学者们看来:治理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15],是实现政府与社会相互协助的“合作治理”^[16],也是“多个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和持续互动”^[17]。从 1988 年起,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此,社区治理成为下沉到社区空间的一种治理格局,为的是发挥“基层稳定器”作用。社区体育治理作为推进社区治理和完善治理体制的“桥头堡”“前哨站”,是多元主体在制度协调下,通过协商、合作的运作机制,运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共同处理公共性事务的互动过程。这一互动过程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才可实现。因为,政府部门与市场组织均存在“失灵”隐患,社区居民自治能力与意识较弱,决定了单一主体不足以应对社区体育治理中的所有事物。

当然,对于什么是治理以及如何治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其本质是一种获取制度性秩序的集体行动过程(见图 1)。直接成本(财政资金、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与间接成本(行为规范、制度建设等)的付出是其基本条件。此外,这样的秩序获得,必须要在主体参与、机制运行、制度布局、技术运用等要素的配合下才能够实现。



图 1 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过程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居民体育需求作为始端,是治理实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具体来说,政府一方面

为了维护居民的体育权利,另一方面为实现自身职能转型的需求,通过制度性安排将非营利性体育组织、营利性体育组织有序地介入社区体育事物的治理中。例如 2015 年,国务院转发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单位起草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文件颁布的基本用意既是为了解决政府自身能力不足,又是为推进社区体育治理而做的秩序规定。在政策背景下,各地政府借助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手段,将体育组织和经济实体纳入治理格局,居民在“消费”的同时,提出相应的反馈意见进而参与治理。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国民体质监测体系的建立、全民健身步道的修建^[18]。在社区体育共同利益的追求中,多元治理主体有组织化地采取集体行动。因此,可以认为社区体育治理的实施就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体育组织介入、社区居民参与,实现“需求、供给、消费、维护”一体化的集体行动。

3 集体行动视角下社区体育治理困境及其成因

近些年,社区体育治理的推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依然存在着主体之间联动机制不健全、运行体系不顺畅、主体之间治理能力难以整合、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19]。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解释。如,就体育社会组织而言,“因为缺乏公共性、专业性、自治性、整合性,导致组织整体认同度不高,造成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性困境”^[20]。就市场组织而言,“基于商业模式的不成熟与具体产业政策的缺乏,市场主体参与动力受到抑制,现行政企合作途径存在一定的商业风险”^[21]等。本研究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分析社区体育治理的困境并进行成因阐释。

3.1 集体行动视角下社区体育治理困境

3.1.1 公私利益的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指在面对合作时,即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保持合作也十分困难。“囚徒困境”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建设中集中体现在“供给”阶段。社区体育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科层体制组织形态下是由多个政府部门、多成员共同施策的公共性事务。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的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科层制的“过程理性”使得办事人员的行为体现出浓厚的理性色彩。

在实践中,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各部门,存在着“理性经济人”与“公共管理者”的身份重叠,常因采取自身利益优先的策略而陷入“囚徒困境”。以沈阳市某体育公园的修建与管理为例,位于和平区的体育公园于2003年5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群众反映:“体育公园建成后长期无人管理,致使体育公园陷入‘无人认领’的尴尬境地”。虽然群众已经反映至相关部门,但是当新闻记者回访后发现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对于此事,先后致电的沈阳市体育局、和平区城建局、和平区城管局、和平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均表示:“所在单位不负责体育公园的管理”^[22]。在后续跟进报道中,和平区城市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声称:“涉及公园里面的事情需要联系和平区城管局。”和平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声称:“经过确认,体育公园出现的问题,不在城管局职责监管范围内,建议记者联系体育局。”和平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体育公园由沈阳市体育局管理。”沈阳市体育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却声称:“过去体育公园绿化和设施由城建部门负责,现在还没有正式移交给体育局,因此不知道由谁来管理。”从上述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各单位都在极力地推诿自身责任,并没有展现出部门间持续合作的样态。

众所周知,体育公共场地的规划与修建需要城市园林主管部门、城建规划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体育行政部门等多方合作,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才会确立最终方案。这种多部门联合施策的行政程序决定了所涉及的部门均负有相关责任关系,理应合作进行管理。然而,各部门将完成行政绩效考核作为主要任务,尤其是在削减政府财政资金的政策背景下,控制自身行政成本更是成为了重要考核指标。由此,为了控制自身成本,各单位都选择将自身责任“归零”。进一步来看,体育公共用地的管理服务从根本上属于民生工程,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这与政府部门考核中存在的“唯经济指标论”存在悖论。体育公共用地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单一部门有限的财政预算与人员规模导致其难以独自应对,需要其他部门的协助。但是展开合作后,所产生的成本(人力、物力、财力)与收益(政绩、指标、成果)没有规定按照什么比例抽成。就算合作后能通过收取费用产生经济收益用以平衡自身支出,但是这又与现行规定背道而驰。因为,政府部门作为公共管理者,法理上承担着社会公共性事务,而民众

作为政府的纳税人理应享有政府的管理服务。由此,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明晰、生硬刻板,缺乏协调机制的建立完善与有效运行,成为了难以保持合作的内在机理。

3.1.2 公私权责的模糊,造成“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由哈丁基于“理性经济人”所提出的关于公共性事务管理的集体困境模型。所谓公地悲剧是指因过度使用资源而引发的一种失灵现象(这里的资源是指: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部分公共物品,包括土地、空间等一切公共资源)。公地悲剧的产生需要满足四个基本前提。其一,相对封闭且有限;其二,任何人不受限制的使用资源;其三,使用者是“理性经济人”;最后,规范制度的缺失。

“公地悲剧”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建设中具体体现在“消费”“维护”阶段,其中“消费”对应“权利”,“维护”对应“责任”,两者是有机的整体。“公私权责模糊”则是导致“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23]。西方国家是基于“契约精神”而形成的理性思维产物,与之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与家始终是一体,即“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它们之间是具有浓厚感性色彩的一种关系构建,但伴随的问题就是“公私权责模糊”。在过去,“公”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私”^[24]。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是一体的,彼此之间的权责边界并不明确;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私有化”意识的浪潮使得理性思维与感性情感融合形成了一种“中立意识”,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中和”;随着社会转型,社区逐渐成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这种权责模糊也在社区中开始体现。

在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大量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甚至是被侵占的现象。例如,近些年有关“广场舞”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究其根本在于,社区成员在“所得归己,所耗归公”的观念驱动下,只顾自身体育权利的行使,却忽视了维护公共秩序与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与义务。健身团队为了自身的体育锻炼诉求,侵占公园场地、篮球场地,枉顾其他体育群体的使用需要,进一步引发群体冲突事件,逐步形成了一种托克维尔所说的以自己为中心、“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的个人主义情感^[25]。更具体来看,社区资源在性质上属于共有财产,尽管已有明文规定社区体育用地应占一定比重,但是仍有房地产开发商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将社区公地占用改建停车场等,致使体育用地“枯竭”。营利性体育组织作为政

府部门的合作伙伴,协同配合进行治理行动,减轻政府管理者的负担。现实却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经济支出,开办的体育培训班挤占公共用地,甚至兴起“圈地运动”^[26],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反而加大了治理难度与政府的成本支出。社区体育资源的维护应由管理者、使用者共同承担,但是目前尚未规定各方支付比重。因此,在涉及维护方面的问题时,因为社区体育资源的公共属性,社区内各方推诿责任,最终政府往往是费用的支出者。然而,有限的财政预算限制了维护的覆盖面积,致使众多社区内体育设施、场地“年久失修”。由此,造成了社区体育治理的“公地悲剧”。

3.1.3 “短期利益至上”,难解“搭便车怪圈”

“搭便车怪圈”是指不付出成本而坐享他人成果的一种投机行为,典故中的南郭先生便是生动诠释,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短期利益至上”的一种投机心理。“搭便车怪圈”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前提。其一是理性经济人;其二是存在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当共同利益一旦实现,任何人都能享有这一收益的时候,理性成员会竭尽所能选择“搭便车”来使自身付出的成本最小化。

“搭便车怪圈”在社区体育治理的过程中,体现在每个阶段的居民参与和政府部门的参与。居民作为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之一,不仅是治理需求的意见表达者、治理建设的行动提供者,还是治理成果的集体享用者、治理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但是在实践中却呈现出需求多但贡献少的局面。一方面,因为社区体育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存在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的居民群体并不掌握话语权,只有少数精英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27],居民之间的高异质性低认同感致其难以结成利益共同体^[28];更重要的是居民普遍存在投机心理,即“我不管,反正有人管”“谁爱管谁管”。对于居民群体来说,是个体的行动构成了集体的行动,只有每个成员的行动一致才会实现集体目标。然而理性的居民会在成本-收益的博弈中选择利己性的行动决定。具体体现在:当居民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时,因为最终成果是由集体成员所共享,所以在收益上无法体现所付出成本的差异,长此以往积极者便会失去参与的动力源;进一步说,因为社区的居民众多,当居民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影响集体收益时则会产生投机心理来降低成本,选择性减少付出或不付出,但是在最终收益上却获得了与其他人同样的效果,长此以往他们会产生“有我没我都一样”的

投机心理。在双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每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这便走入了“搭便车怪圈”。

作为政府部门来说,制度创新与供给是其垄断性的权力,具有非排他性特征。但是,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坐享上级、同级、下级部门成果的“搭便车”行为较普遍。具体来看,当上级部门的有关社区体育治理政策出台后,地方部门并不会主动寻求创新,而是按部就班地执行其政策内容。因为,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政治性风险与经济成本支出的不可控极易损害自身利益,在问责制度的高压下会直接影响政绩考核;另外,目前对于社区体育治理的成文法与规范性文件并未出台,各地仍然处于自我探索阶段。当出现了“上海模式”“北京模式”这些具有成功经验的模板后,各地政府纷纷效仿进行推广,为的是降低自己的“试错成本”。具体到社区层面来看,因为社区中的居委会在法理中承担着为上级部门的服务工作,作为工作内容之一的社区体育治理,自然成为了重要的考核内容。在上级部门的考核高压下,社区居委会不得不想方设法“做出成绩”来获得上级认可。但是,在现行的科层行政体制下,下级部门的创新成为上级部门的“业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潜规则”。由此,政府部门的“搭便车”行为,成为又一体现。

3.2 “理性”的冲突:集体行动困境的成因所在

理性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也是现代哲学对人的本质的定位,反映了现代社会交往所需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从利己性的角度参与集体行动,枉顾了作为集体成员所要遵守的集体行为规范与社会伦理准则,而这正是政治哲学中所说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公共理性的含义非常宽泛,包括政治哲学与道德伦理。罗尔斯在其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系统性论述了公共理性,他认为公共理性就是各个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29]。公共理性的存在,本应建立统一的共识观念,维护公共正义;本应通过道德伦理,约束个体行为。但是,在社区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交织的场域,协调二者的关系却异常艰难。更进一步来看,之所以“理性”冲突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形成,是因为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与较低的行为约束时,出于生存本能,个体理性

就会优于公共理性。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区别在于行动逻辑与期待有所不同,即“利己”与“利他”。“利己”意味着选择资源向内流动,满足生存发展的期待,而“利他”则意味着选择将资源向外输送,为的是满足公共期待。社区体育治理从其内涵来看是一

种“利他性”的社会活动,但是当“囚徒困境”“搭便车”等现象出现后,因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多变性,个体出于自我保护别无他法地更加倾向于个体理性选择。由此,公共理性与个体理性发生冲突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在所难免(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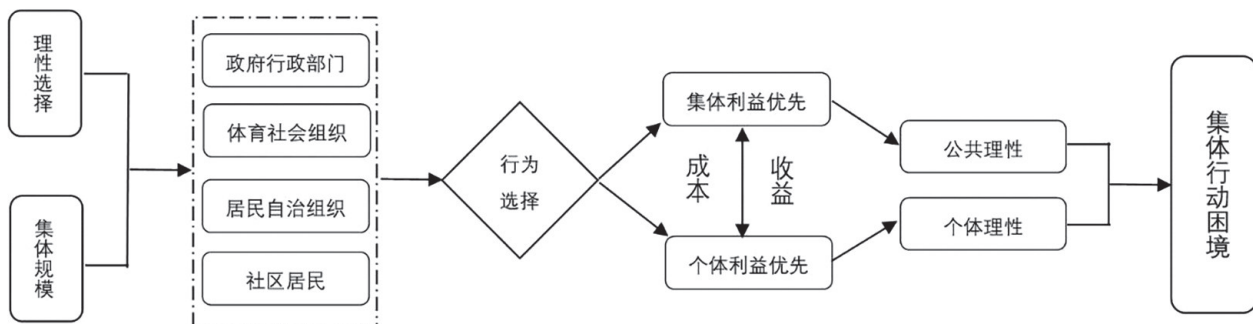


图2 社区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

4 社区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破解路径

4.1 形成双向合力:融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

破解社区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应治其“根”,即协调好理性的关系、利益的关系(见图3)。理性的背后是利益驱使,利益就是人行为的动机。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融合,其内涵在于:通过对个体理性的重塑,建立共识观念;通过对公共理性的唤起,维护公平正义,进而实现“理性融合”,消弭利益分歧。这一目标的实现,既要依托内在化的动机驱使,又要依靠外在性的制度技术。一方面,通过理念转变建立正确的社区体育治理观念,纠正认识偏差。注重情感因素在现代社会对人的潜在影响,内化道德伦理,加强自我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维护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强化外部监督。应用技术手段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促进集体行动。通过个体理性的重塑与公共理性的唤醒,形成内部驱动与外部推动的合力(见图4)。

4.2 重塑个体理性:治理理念的引领、治理情感的共鸣

个体理性代表着人的基本诉求,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个人利益本位”的思想冲击了集体主义思想,人的行为逐渐具有趋利的特征。但是,“纯粹理性人”并不存在。根据涂尔干的观念论,人的行为会

受到观念的影响(包括:集体意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社会意识、集体意识的作用下,社会成员会做出“利他性”的行为选择。因此,通过集体意识、社会意识等观念形态来重塑个体理性,强化“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有机联系,是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前提。

4.2.1 “人民至上”“人人有责”的理念引领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指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30]。就社区体育治理的现实而言,只有契合人民的体育需求,动员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行动一致地解决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才可避免社区体育治理实践的集体行动困境。具体要从以下三个维度的创新来实现理念上的引领。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社区体育治理的归宿是社区居民。因此,要本着“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正确思想定位,从人民实际需求出发,满足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切实提高社区体育治理能力。

第二,坚持“人人有责”的治理理念。“人民至上”并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而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大体育治理格局”。“人人有责”不仅是一种政治追求,还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式,它代表的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通过全民参与,实现社区体育治理从政府主导、政府负责向政府服务、共同参与的转变^[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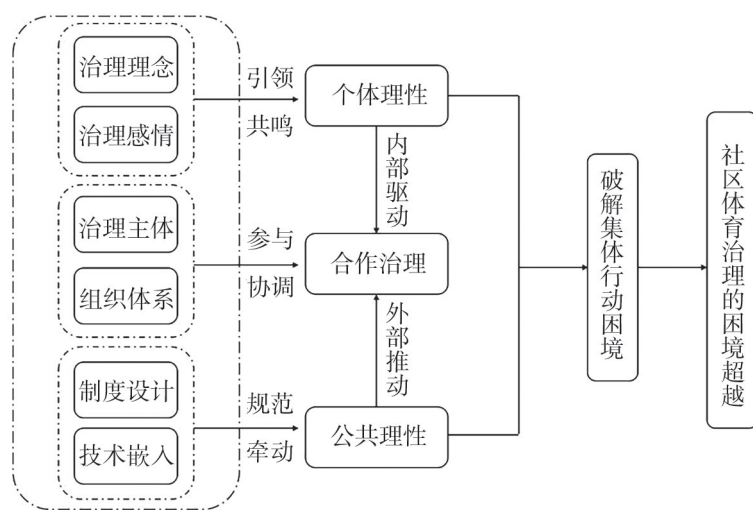


图3 社区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破解：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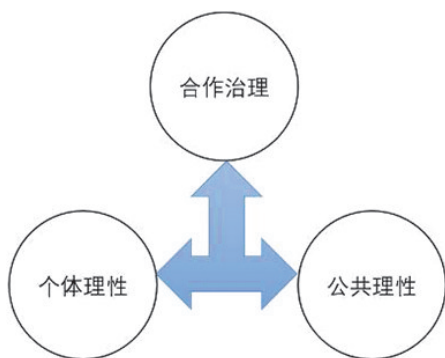


图4 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双向合力

4.2.2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情感共鸣

根据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可见，社区不仅是基于地理空间相邻而结成的联合体，更是一种有温度的社会关系构建。由此，社区体育治理理应重视情感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作用。

情感是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的结合体，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32]。只有当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各主体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感，才会产生参与的内生动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便是生动诠释。具体包括以下两个维度的创新。

一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构建。信任被视为一种依赖关系，蕴含着相互认可并放心于托付的利益互动。从社区体育治理的现实来看，治理主体基于统一目标，在信任的关系构建下结成一条长期的利益

链，只有集体行动促使集体利益最大化，个体利益诉求才会得到满足。由此，通过对资源、信息的共享实现治理能力的整合，以提高治理能力的效能与持续性。

二是以互利为前提的利益关系构建。互利是指资源有限或缺失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支出成本，旨在高效地利用资源的一种对称性的规则。其基本目的是消解多元利益主体行为的额外负外在性结果，以此降低交易成本来维系多方制衡。因为社区体育治理涉及多方治理主体的切身利益，囿于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行动准则，相关主体往往在现实操作中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进而损害集体利益。通过互利的利益关系构建，能有效避免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等投机行为，有效降低支出成本，进而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集体行动一致。

4.3 强化公共理性：强化制度设计的规范、技术嵌入的牵动

强化公共理性，一是为了建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二是打通彼此之间的合作壁垒；三是整合各主体之间的分散力量；四是建立起畅通的运行体系与合作机制；五是为了构建各成员之间的有机团结（以差异性为基础而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六是为了规范个体的行为模式与社会交往活动。

4.3.1 坚持“德法双治”，筑牢社区体育治理的法治保障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科学的制度设计可以规避个人行为的自利性问题^[33]。因为，正式制度构成了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与约束，而非正式

制度生于人们的长期社会交往活动中,构成了一套“软控制”的行为规范,从而限制了人们行动的随意性与自利性。因此,对于社区体育治理的制度设计也应从强硬与细软两个维度进行创新,在这其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则是关键。具体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创新来实现。

一是打造社区体育文化,实现“德治”。社区体育文化是在长期的社区体育活动中形成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交往方式,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社区体育文化在社区体育治理中主要起到“缓冲器”的作用。社区体育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共同目标的聚焦,对于背弃共同目标、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能有效地约束。因为这种约束来自社区体育文化本身,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一旦形成就具有一种“体育文化驱动力”,推动人们按着集体行动规范进行活动。打造社区体育文化,一靠宣传、二靠参与。通过社区文化墙、文化活动站、社区便民点大力宣传社区体育文化,以此铺垫群众基础;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培养居民参与意识,提高治理能力,以此形成互动、反馈过程。

二是规范社区体育治理,实现“法治”。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个涉及社区体育的政策法规,但从政策法规本身和贯彻执行的实践上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最明显的体现是政策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尚未建立相关的实施细则等配套政策措施,难以操作或不具有可操作性。如,《全民健身条例》指出,学校应当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体育设施,公办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但缺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时间的底线要求,也未体现具体的补贴办法,导致其在落实中缺乏约束性与激励性。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指出,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其他社区组织应当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但缺乏可操作性评估。为此,需要不断强化法治建设,完善政策法规的配套制度与措施,明确和规范社区体育治理各主体的职责,协调社区体育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4.3.2 强化“科技赋能”,牵动社区体育治理的现代化

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嵌入新兴技术是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环节,从技术层面支持社区体育治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的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创新。具体来说,通过新兴技术的嵌入,将传统的“条条块块、条块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格局,以数字

化的连接方式转变成为“网络化”治理格局,重构社区生活空间与治理主体之间的运行机制^[34],有效地规避了科层制的僵化弊端,克服了多元主体参与的通道不畅等技术难题。通过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搭建,使得社区体育治理的治理主体间形成平等、互助、公开、包容、合作的集体行动机制,降低了主体参与治理过程的支出成本,整合了分散化、碎片化的社区体育资源与社区体育信息,实现了从“行政动员”到“全民参与”、从“静态调查”到“动态反馈”、从“运动式管控”到“数字化联动”的社区体育治理现代化。

5 结语

社区体育治理的困境超越,只有真正落地才能提高治理的效能。人作为社区工作中的关键性要素,是具有随意性、自利性的不稳定变量,当诸多不稳定的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中时,难免出现集体行动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设计优势,降低了不同治理模式的能效。因此,只有破解社区体育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实现“理性互融”,才能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有效化、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但是,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是否能够依靠技术手段来破解这一难题,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汪芳久. 城镇化背景下的转型社区治理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D]. 苏州:苏州大学,2021:1-165.
- [2]郑旭涛. 集体行动:概念比较中的理解[J]. 探索,2020(04):64-75.
- [3]隋晓妍. 社区更新的合作治理机制研究——以厦门市沙坡尾社区为例[D]. 厦门:厦门大学,2019:1-63.
- [4]吴忠民. 论中国现代化的乘数效应[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5-19.
- [5]余太盛. 公民城邦与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伦理观[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45(01):12-18.
- [6]谢岳,曹开雄. 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7(03):13-20.
- [7]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M]. 张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
- [8]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
- [9]HARDIN G. J.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1968

- (162):1243-1248.
- [10] SHUBIK M. Game theory, behavior, and the paradox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three solutions[J]. Conflict Resolution, 1970, 14(02):181-193.
- [1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4.
- [12] 沈荣华, 鹿斌. 制度建构: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10): 41-45.
- [13] 任海, 王凯珍, 王渡, 等. 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概念、构成要素及组织特征——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探讨之一[J]. 体育与科学, 1998(02): 12-16.
- [14] 俞可平.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8.
- [15] 郁建兴, 关爽. 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J]. 探索与争鸣, 2014(12): 7-16.
- [16] 张康之.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04): 1-8.
- [17] 许耀桐. 深化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J]. 前进, 2020(08): 29-31.
- [18] 郭玲玲. 社区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 49(01): 10-14.
- [19] 孟云鹏.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主要成就、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6(03): 323-331.
- [20] 王凯. 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体育治理的主体困境与建构路径[J]. 体育学刊, 2020, 27(06): 51-56.
- [21] 刘京, 刘应民. 均衡与重构: 城市社区体育风险治理的破壁之道[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03): 18-24.
- [22] 沈阳体育公园遇“无人认领”尴尬“脏乱差”谁来管? [EB/OL]. (2017-04-18) [2023-04-18]. <http://news.sina.com.cn/o/2017-04-18/doc-ifyeifqx6215136.shtml>.
- [23] 唐清利, 何真. 公私权模糊领域社会治理的理论路径——基于日常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J]. 管理世界, 2016(12): 102-115.
- [24] 李萍, 杨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J]. 现代哲学, 2020(05): 1-11.
- [25] 王小章, 冯婷. 集体主义时代和个体化时代的集体行动[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05): 45-51.
- [26] 北京: 儿童培训机构公园“圈地”与健身锻炼群众产生矛盾[EB/OL]. (2021-04-20) [2023-05-22]. <https://new.qq.com/rain/a/20210420A0875100>.
- [27] 盛智明.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强人政治”与公共性困境[J]. 河北学刊, 2016, 36(06): 160-164.
- [28] 姜晓萍, 衡霞.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J]. 湖南社会科学, 2007(01): 24-28.
- [29] 史云贵. 论合作治理中的合作理性[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11): 190-195.
- [30]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市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 人民日报, 2020-06-16(09).
- [31] 郁建兴, 任杰.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J]. 政治学研究, 2020(01): 45-56.
- [32] 乔纳斯·特纳, 简·斯黛兹. 情感社会学[M]. 孙俊才, 文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17.
- [33] 吴光芸, 杨龙.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 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J]. 东南学术, 2006(03): 11-16.
- [34] 王雪竹. 基层社会治理: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J]. 理论探索, 2020(02): 76-80.

[责任编辑 江国平]